

女人扶犁？——女拖拉機手在中國

余敏玲

《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抽印本

2006年8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女人扶犁？——女拖拉機手在中國*

余敏玲**

哦！火犁，你是鋼鐵的戰馬
火犁，你是我們親愛的戰友
你發出愉快的聲音
我們已到了開耙時候
我們走過田野
駕著神馬馳行！……

1950年6月3日，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隊在黑龍江省德都縣成立。隊員們駕駛著插上紅旗的拖拉機，齊聲歡唱拖拉機之歌。¹女拖拉機手是中共建國之後亟欲塑造的一種社會主義新人典型和新中國婦女的模範；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實踐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提倡的新民說。

清末以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爲了救亡圖存，因此有塑造新國民之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梁啟超的〈新民說〉，強調新國民需與國家形成命運共同體。這些知識分子認爲中國的「舊國民」

* 本文承蒙國科會的資助（計畫編號：NSC91-2411-H-001-076）。在此特別感謝定恆莊教授和王奇生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張振義，〈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隊〉，《人民日報》，1950年7月16日，4版。

已經無法擔當抵禦外侮之責，只有培養以愛國為己任的「新國民」，方能使中國免於瓜分與亡國之危。然而他們當時對此議題只停留在討論階段，沒有付諸行動。到了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共產黨以強勢的國家力量來推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其規模之大，涉及之廣，動用人力之多，遠非過去一群在野知識分子單靠著書立說的薄弱力量可以相比。

對毛澤東而言，革命不只是政權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一場從根做起的社會改造。革命不但是要改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連風俗習慣、道德、思想、行為模式、價值觀念等都應該隨之改變。因此，毛取得大陸政權之後，如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建立新的人生觀，並且能夠配合當前政策的推展，成為中共的重要關懷。1950年代的中國流行一句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以俄為師，蘇聯女拖拉機手所提供的典範，也成為教育中國婦女的新榜樣。

當今研究1949年以後中蘇關係，焦點多放在探討上層政治或國際關係方面。對於中共建國初期全面學習蘇聯這一政策的宣傳與落實，及其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鮮有學者予以注意。²另一方面，從晚清提倡新國民（新國母），到五四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再到

2 Mineo Nakajima,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Taipei: Caves Books, Ltd. Reprinted, 1989);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borah A.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孔寒冰，《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沈志華的《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是大陸學者中研究中蘇關係的一個突破，該書不但分析上層政治，而且涉及政策落實與民間反應。

1930-1940年代左右派爭論新婦女形象，所採用的論述均不離國族主義的大帽子。中共革命成功後，其婦女政策亦然。1960-1970年代，大多數西方學者受中共有關文化大革命宣傳的影響與資料的限制，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帶來婦女解放。³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80年代的西方學者開始修正先前看法，認為所謂婦女解放，並非事實。原有的男女不平等反而因為共產革命而更強化了。⁴他們批評過去的學者很少探索被視為中共解放對象的婦女的真正感受，不問她們是否覺得已經生活在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遑論進一步追問這些婦女本身所瞭解的男女平等概念是什麼。近年來西方學者已經有所補救。他們開始就婦女如何瞭解與回應官方有關婦女解放的宣傳進行討論。⁵反觀中國大陸學界，在毛澤東時代根本談不上研究，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所謂「研究」完全跟著官方路線走，大聲高唱婦女已經得到解放、婦女撐起半邊天的曲調。一直要到改革開放之後的80

3 Sheila Rowbotham,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4); Judith Stacey, "When Patriarchy Kowtow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Family Revolution for Feminist Theory," *Feminist Studies* (April 1975), pp. 64-112; Della Davin, *Women 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Claudie Broyelle,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77); Eliz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4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hyllis Ander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Barbara Entwistle & Gail E. Henderson, ed.,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回顧西方學界對二十世紀中國婦女研究的最新論文，詳見 Gail Hershatter, "State of the Field: 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4 (Nov. 2004), pp. 991-1065。

年代，才慢慢摘掉國族主義論述的帽子，開始從婦女自身的角度及其利益來分析婦女問題。⁶

本文以女拖拉機手的宣傳與實踐為個案，探究中共國族主義論述下的新婦女典型，並從婦女角度分析其自身體驗；同時闡析中共在學習蘇聯、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過程中，性別扮演何種角色？中共大力宣傳婦女進入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職業場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婦女響應黨的號召，成為拖拉機手之後，實際的工作內容和生活情況與他們原來的期望有何落差？她們是否已經感到男女平等？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官方宣傳中的男女平等，其實質意義何在？

再者，本文將以此案例，比較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蘇女拖拉機手處境。或許有人認為比較理想的中國對照是北韓與越南，而不是蘇聯；因為中國與這兩個國家文化背景相似，進行比較，更能看出中國在學習蘇聯上的特殊性與差異性。但是目前幾乎沒有這方面的中英文著作；有的也只是蜻蜓點水，利用官方資料簡單提及學習蘇聯而已。⁷其次，雖然中蘇兩國的地理環境、歷史發展、文化背景歧異之處頗多，但是中蘇同為大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共同致力於共產革命的時間也最長，兩國領袖莫不希望重振大國雄風，側身強國之林。中蘇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與塑造新人的道路上，所面臨的問題與規模，遠非小國寡民的越南或北韓所能相比。此外，中蘇兩國均曾轟轟烈烈地推出女拖拉機手樣版，卻又幾乎不約而同地

6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平等與發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李秋芳主編，《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7 Kyung Ae Park,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Korea," *Pacific Affairs* 65:4 (Winter 1992-1993), pp. 527-545;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在1990年代初立法禁止女性擔任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背後考慮的因素相似，引人深思。

一、中共建國初期的女拖拉機手宣傳與典型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式中，豪氣千雲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鼓舞、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他同時也宣稱過去備受壓迫的工農群眾和婦女，現在都可以當家作主了。對中共而言，舊社會統治階級剝削工農勞動者致富，輕視勞動；新社會則重視勞動，因為新社會的主人，是勞動大眾——勞動越多，生活越得改善。「婦女必須要參加生產，以推進社會的發展，爭取經濟獨立，這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關鍵」。婦女只要參加社會生產事業，就能享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⁸所以，隨著革命的成功，婦女參與勞動生產，就能獲得解放，男女也就平等了。事實上，男女平等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若要從理論與實踐層次來全面探討男女平等，可以寫出成堆的專書。不過，若將其與勞動相聯，這裡只需指出一點，共產黨相信婦女參與家務以外的勞動，擔任過去只有男性才從事的工作，就證明了婦女爭取到男女平等的地位。女拖拉機手更是典範。

拖拉機的普遍別稱是鐵牛，滿洲國時期在東北又稱為火犁或洋犁。拖拉機象徵農村嶄新與明亮的一面，代表著現代與進步。拖拉機在中國的使用，最早可溯至兩次大戰之間，日本農業移民組成的開拓團在東北進行墾殖。當時德國拖拉機廠蘭斯(Lanz)曾在瀋陽有代理商，出售與維修拖拉機。1945-1947年，聯合國救濟總署送了將

8 區夢覺，〈怎樣做一個新社會的新婦女〉，《新中國婦女》，創刊號（1949年7月），頁9。

近2,000台拖拉機到中國，其目的並不是要促進中國的農業機械化，而是要協助河南災後重建。1938年，蔣介石為阻滯日軍迅速南進，曾在河南炸開黃河大堤，引發大水。大水過後，野草蔓生，只有拖拉機可以斬草除根，使農地可以重新耕種。這些拖拉機在犁過幾百萬英畝的土地之後，因為缺乏零件與維修，加上沒有燃料逐漸被棄置。1947年秋天，聯合國救濟總署被解散，拖拉機站也正式關門。⁹

中共剛剛接收東北之際，曾經重新拼湊組裝從日本開拓團收繳而來的許多殘缺不全的美製、德製拖拉機，用來開荒種地。其後，蘇聯也陸續運送拖拉機到中國，成為中共建國初期拖拉機的唯一來源，直到1950年代後期，才有東歐進口或中國自製的拖拉機。

最早的拖拉機手來自開拓團的中、日駕駛員。1948年4月蘇聯拖拉機運抵東北後，中共建立甯安、通北、趙光、花園、永安、查哈陽等國營農場；進而開班招生，使東北成為中國最早開辦拖拉機班的地區。¹⁰此外，美國左派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亦曾協助中共在河北冀縣成立拖拉機班；當時72名學員之中，只有3名女性。¹¹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咸認女人不能扶犁，否則會壞了莊稼。中共則以女人能扶犁，而且是能操作機械化的火犁，來展現婦女參與勞動的光榮偉大及新社會的進步與解放。中共認為女拖拉機手代表了婦女告別舊社會的苦悶與封建，迎接新社會的美好與希望。婦

9 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ary in Chinese Farming*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p. 1, 15.

10 楊清海，〈花園農場的初創年月〉，頁4；房福田，〈艱苦豪邁的開荒生活〉，《拓荒者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16-17。

11 韓丁乃左派世家出身。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身分到重慶，並同毛澤東有過多會談。1947年，他又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員的身分到中國。William Hinton, *Iron Oxen*, pp. 1, 8, 15, 28; 王永福，周毅文，〈一個老朋友的意見〉，《人民日報》，1978年9月23日，2版。

女終於可以走出家門，與男人並肩工作而沒有羞辱感，這也就是婦女在新中國的翻身。女拖拉機手因此成為社會主義新婦女的代表之一。在官方機器宣傳這種社會主義新婦女之際，也同時意含新中國將成為一個農業機械化的現代國家。

1950年代初期是中共最密集宣傳女拖拉機手的時候，這與形塑中國的新形象和施行農業政策關係密切。1952年底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開始加速推行農業合作化。職是之故，中共在宣傳女拖拉機手之際，也連帶宣傳集體農莊幸福快樂的生活，冀圖以此達到推行農業集體化的終極目標。這段期間官方藉由宣傳女拖拉機手所呈現出來的農村婦女新形象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婦女快樂並自覺地參加生產，且以出外勞動為榮。她們即使遭遇困難，也會不畏艱辛地完成工作。由於當時尚在韓戰的陰影籠罩之下，所以官方的宣傳也強調會開拖拉機，就會開坦克車，這樣就可以保衛祖國。

中共宣傳女拖拉機手的途徑，包括報章雜誌、教科書、漫畫、海報（或稱宣傳畫）、展覽、電影等等。對於文盲佔多數的中國而言，圖像比文字宣傳更具影響力，其中蘇聯電影是最能引起大眾興趣的媒介。例如，電影《她在保衛祖國》（又譯為《巾幗英雄》），劇中的女主角原是一位賢妻良母兼能幹的女拖拉機手，德軍的入侵摧毀了她幸福美滿的生活；丈夫戰死，幼子被德軍的坦克壓死，她憤而組織游擊隊對抗德軍，並親自駕駛坦克殺敵。同樣地，在電影《拖拉機手》劇中的女主角是位女拖拉機隊長，性格明朗，熱情豪邁，志趣高尚，熱愛勞動，竟日穿著工作服。這部拍攝於1939年的電影所傳達的另一訊息是，農民必須學會開拖拉機，也要學會開坦克車，才能對付可能入侵的敵人。同時，劇中也展示了集體農場機械化的優點。凡是拖拉機耕過之處，犁痕深淺適度，整齊畫一。

在眾多蘇聯電影之中，最能展現集體農場的富裕和快樂生活的電影是《幸福的生活》（又譯為《庫班河上的哥薩克》）。影片開始未幾，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堆積如山的各種農產品，令人垂涎欲滴；黃金般的麥浪滾滾，充滿整個畫面，在在宣示了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平日辛勤認真工作且以參與生產為傲的女拖拉機手，在收成之後均換上美麗花俏的衣裳，快樂地結伴遊玩，在市集的每一個角落都能聽到她們銀鈴般的笑聲。此外，劇中還穿插著最令青年男女嚮往的談情說愛。整部片子所呈現的農村生活如此地浪漫與美好，令人不覺心生羨慕。農民的人間天堂捨此為何？為了配合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中共還將這些電影譯成蒙古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粵語等，在中國各地播放。

除了宣揚蘇聯集體農場與女拖拉機手的美好生活之外，號稱蘇聯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Паша Ангелина)的事蹟，亦是中共官方宣傳重點。¹²安格林娜在1930年代初被蘇聯有關當局奉為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當時史大林實行五年計畫，意圖儘速將蘇聯建設成爲現代工業國家。由於農村男性大量湧向城市工廠，農村缺乏勞動力，安格林娜因此被樹立成女拖拉機手的樣板，以便吸引更多農村的婦女投入農業生產。

安格林娜是烏克蘭人，她克服了父兄與朋友的阻撓，在1930年（年僅16歲）成爲女拖拉機手。1933年她不顧村人的反對，組成一支女拖拉機大隊。1935年底得到列寧獎章，1937年底被選爲最高蘇維埃代表（此後每年都被選爲代表，直到她死爲止）。1938年，

¹² 事實上，早在安格林娜之前，蘇聯頓河地區即出現全國第一批女拖拉機手。Sue Bridger, "The Heirs of Pash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Woman Tractor Driver," in Linda Edmondson, ed., *Gender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95.

她喊出「十萬婦女朋友上拖拉機」的口號，從此成爲蘇聯家喻戶曉的人物。¹³她將蘇聯宣傳中的農民當家作主、集體農莊的富裕與幸福，完全歸功於十月革命、黨的領導和蘇維埃制度的偉大，而不是她個人的努力或其他特殊因素所致。中國的《人民畫報》、《人民日報》、《新中國婦女》均曾以圖片或文字的方式報導她的事蹟。爲迎合教育水準較低的讀者，中共當局還將關於安格林娜的書翻譯和改寫成爲章回小說。¹⁴

不過，安格林娜畢竟是外國人，對於中國老百姓而言，可能沒有足夠的親切感，唯有推出中國自己的女拖拉機手才會更具親和力和說服力。東北是全國最早實行農業機械化的地區，欲從中尋得與塑造女拖拉機手的典型，並非難事。1950年，中共即轟轟烈烈地推出中國的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貧農出身的梁軍，是黑龍江省明水縣人。1947年，進入德都縣萌芽鄉村師範學校半耕半讀，她看了蘇聯電影《她在保衛祖國》之後，欽佩與羨慕劇中主角巴莎會開火犁，且能開坦克，從此便夢想當拖拉機手。1948年2月，她報名參加黑龍江省北安拖拉機手訓練班，是七十多名學員中，唯一的女性。最初機師不肯教她，理由是開拖拉機會弄得全身髒兮兮，不適合女性，許多男同學也在旁嘀咕：「女人還來學開火犁啦！」他們都不贊成收女學員，認爲女人不能學習這種只有男性才能勝任的工作。

¹³ 據說有二十萬名婦女響應她的號召。П. Ангелина, *Люди колхозных полей* (在集體農場田野上的人) (Москва: Гос. Изд.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с. 21-30, 67.

¹⁴ 《蘇聯女勞動英雄巴夏·安琪琳娜》，《新中國婦女》，1950年第6期，頁31-32；〈我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戰鬥著——蘇聯第一個女拖拉機手安格林娜〉，《新中國婦女》，1952年第1期，頁25；王大成譯，《安格林娜的故事》（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安格林娜自傳》（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陸梅林與海天根據安格林娜的《我的集體農場生活》與《在集體農莊田野上》二書改寫成《集體農場生活》（上海：元昌印書館，1951）。安琪琳娜和安格林娜指的是同一人，譯名不同而已。

幸虧校長支持，方得機師首肯；加上她特別認真學習，不辭艱苦，終於順利完成訓練。1950年6月，梁軍與11名婦女組成了中國第一支女拖拉機隊。她們感謝共產黨與毛主席讓窮人翻身，從此能夠過著幸福的生活。¹⁵同年，梁軍當選全國農業女勞動模範並參加中國勞模團訪問蘇聯。梁軍的事蹟與形象自然也成了全國主要媒體報導的對象。她的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強調農村婦女開始了新生活。¹⁶中共甚至前所未有地以梁軍為原型印製第三套一元人民幣，到今天為止，也只有梁軍有此殊榮。

此外，中共特別利用訪蘇歸來的農民勞動模範現身說法，回鄉轉述他們的「蘇聯經驗」，以增加宣傳的說服力。據一位東北合作化時期的老模範回憶，凡是參觀過蘇聯集體農莊的農業勞模們，「個個都羨慕死了那天天喝牛奶吃麵包，春耕秋收甚至連擠奶都是機械化的農莊生活。」他們回國後，向鄉親們描繪親眼目睹的蘇聯景象，以致許多原本沒加入合作社的農民，紛紛簽名入社，大大減低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阻力。¹⁷女勞模在訪蘇期間，特別關心與婦女切身的相關問題。曾是內戰擔架英雄，後來在山東成為女拖拉機手的董力生，就注意到每個集體農莊都有很好的產科病房，女莊員生產可休息兩個月，女拖拉機手因工作較重，可以休息三個月。¹⁸有位四

¹⁵ 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6版；〈英雄模範代表們上書毛主席〉，《人民日報》，1950年10月4日，3版。

¹⁶ 〈女拖拉機手——梁軍與她的助手〉《人民畫報》，封面，1950年8月20日，期2；高盧，〈女拖拉機手梁軍〉（漫畫十幅），《新中國婦女》，1950年第6期，頁2-3；梅青，〈和女拖拉機手梁軍見面〉，《中國少年兒童》，1950年10月30日，頁18-19；宋雲彬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北京：新華書店，1950），冊1，頁70-74。

¹⁷ 張鳴，〈「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老照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輯18，頁114-117。

¹⁸ 子岡，〈蘇聯農民的道德就是我國農民的道德——中國農民代表參觀團團員訪談

川女鄉長回鄉後，對鄉親們作報告，她說過去常聽婦女抱怨：「一天三頓茶飯，空了補補縫縫，還要帶娃兒，哪裡還有好多力量搞生產！」因此到蘇聯訪問時，特別詢問婦女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結果都得到相同的回答：「集體農莊有的是幼兒園、托兒所，你愛把孩子送到哪裡，就送到哪裡好了。至於縫衣服，都有縫紉機；做起來很快，不想做還可以到合作商店去買。……各個集體農莊都有麵包房，婦女們每做一餐飯的時候，只要燒一點菜就行了。有些廚房還有電氣設備，煮一餐飯快得很。」這樣的情景說明了蘇聯婦女不會受到瑣碎繁重家務的拖累，怎會不積極參加勞動？¹⁹這些女勞模的轉述，也等於為中國農村婦女的未來畫出婦女解放、生活幸福的遠景。

就在官方各式宣傳與女拖拉機手典型的鼓舞之下，各地相繼傳出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的報導。例如，大連的楊桂花、安徽省方邱湖農場的焦天鳳、新疆石河子農場的金茂芳。²⁰他們均克服了教育程度低的困難、村人親友的冷嘲熱諷、外在自然環境的艱難挑戰，毅然決然地走出家門，成為女拖拉機手。金茂芳生動地回顧梁軍對她的影響。她說在家看報導時，看到「全國第一代女拖拉機手梁軍從史大林80號上走下來的鏡頭，身材魁梧，臉龐大大的，兩隻眼睛多有神，太陽一照，那樣子就更高大了，跟《西遊記》裡面如來佛在雲端上一樣。她那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我一輩子都記得，就是到

¹⁹ 蘇觀感，〈人民日報〉，1952年9月14日，2版。

燕凌，〈只有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婦女才能徹底解放〉，《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1號，頁8。

²⁰ 丁深，〈女拖拉機手——楊桂花〉，《現代婦女》，1950年第8期，封底（6幅漫畫）；焦天鳳貧農出身，先後擔任村、鄉婦女領導工作，1953年訓練成拖拉機手，1955年授予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1964年全國勞模。〈安徽省第一個女拖拉機手——焦天鳳〉，《安徽之晨》，<http://ahnk.com.cn/jwzh/fjwh-3.1.htm>；田流，〈兩個蒙古族姑娘〉，《人民日報》，1952年6月12日，3版；秀珍，〈京郊五里店國營農場的女拖拉機隊〉，《人民日報》，1952年3月8日，2版。

我開拖拉機後，我下車子的時候都要模仿她的樣子。」²¹女拖拉機手的形象能夠和如來佛相提並論，怎會不讓婦女砰然心動？

女拖拉機手典型的出現等於將社會主義新婦女的形象具體化。她與當時中共大力推行的另一位社會主義新人典型——蘇聯英雄保爾²²具有共同特質：均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無私無悔地獻身於黨；均有鋼鐵般的意志，能夠刻苦耐勞，戰勝一切困難；均致力於革命事業與社會主義建設。唯一宣傳內容有別者，乃在於男女平等，女拖拉機手典型還象徵著婦女解放。

中共宣傳女拖拉機手，並沒有像宣傳蘇聯英雄保爾那樣積極動員，也沒有利用共產黨的各種外圍組織如共青团、婦聯等舉行座談，或廣邀女拖拉機手到各校演講招攬新手，²³或在各地廣為開設女拖拉機班等。究其箇中原因，決策者考慮的不是性別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中國實際環境與發展的限制。這將是下一節闡析的重點。

二、婦女勞動實踐與機耕化發展

中共建國之後，雖然官方極力宣傳勞動神聖偉大，鼓勵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社會生產；但在實踐上卻出現矛盾現象。那就是在理念上提倡男女平等，工作上要去性別化；在實踐上卻又重男輕女，

21 張呂、朱秋德編著，《優秀的女拖拉機手》，《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頁90-91。

22 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新史學》，卷12期4（2001年12月），頁25-74。

23 只有少數女拖拉機手如梁軍曾在大專院校駕駛拖拉機表演。據梁軍說，這樣的表演是為招生。1952年的五一勞動節之後的數天，全國總工會安排來北京參加慶祝大會的勞模到各地參觀，其中包括在清華大學校園看梁軍開拖拉機的表演。李麗影，《幸福的回憶——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江南大學報》，www.jnrain.info/indxb/83wenxue.html；2004年8月2日，筆者在哈爾濱訪問梁軍。

甚至強調性別分工。表面上，女拖拉機手的典型似乎證實了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在邀集女航空人員、女拖拉機手、女電單車司機座談會上所說的話：「新中國第一批婦女新人物的實踐證明了在今天凡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婦女同樣可以做。」鄧穎超進一步說明中國婦女在中共建國之後的勞動成就：「男女平等的權利，正在逐步實現。過去很少婦女或者沒有婦女參加的重工業、交通事業、國防建設等方面，也出現了新型的婦女，如女盤旋工，電車、汽車、火車的女司機，女航空員及跳傘員等等。」在國營農場中也出現了女拖拉機手和女場長。她們為中國婦女開闢了參加祖國建設的寬廣道路。²⁴中共藉著頌揚這些社會主義新婦女勇於進入傳統男性的工作領域，來宣傳勞動的光榮偉大與男女平等。同時，官方也宣傳婦女唯有從事積極又自覺的勞動，才能享有幸福美滿的生活。婦女必須先有經濟獨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社會和家庭各方面和男人一樣獨立，而達到真正的男女平等。²⁵從這些談話可以看出，中共試圖以婦女的經濟獨立與去性別化的工作來彰顯男女平等的理念。

不過，在實踐男女平等這個理念的同時，中共也設定了一個關鍵性的前提：婦女勞動要「事事從國家需要，從集體利益著想。」婦女眼中應該只有黨國的利益，沒有個人前途、榮譽和報酬的盤算。²⁶換言之，新中國的婦女典範，除了要走出家門，熱愛勞動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聽黨的指揮。有了這樣的前提，中共可以視實際情況的需要，隨時「調控」婦女進入勞動場域。

24 〈全國民主婦聯邀女航空人員等座談〉，《人民日報》，1952年3月15日，1版；鄧穎超，〈新中國婦女前進再前進——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週年而作〉，《人民日報》，1952年9月24日，2版。

25 〈社論：用新的勞動態度，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祖國〉，《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2號，頁6-7。

26 〈熱愛勞動是社會主義的高貴品質〉，《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4號，頁4-5。

正因爲有上述的前提，中共在處理婦女出外勞動的工作問題時，會出現先男後女與性別分工的現象。例如，中共剛取得政權之際，其實並不特別鼓勵女性進入職場。這是因爲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共立即面臨安置復員軍人的問題。即使其後有三年的韓戰，但問題依舊。在都市裡，如何安排復員軍人的出路與日益增多的高小以上畢業生就業，已經令有關當局十分頭痛。男性勞力既已過剩，若再鼓勵婦女出來就業，無異雪上加霜。因此，中共透過各種管道，安置無業男性，並鼓勵高小以上畢業生回鄉或下鄉上山。1956年，勞動部長馬文瑞聲稱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已基本解決，城市中閒散的男勞力已極少。姑且不論馬文瑞所謂的已經解決失業問題是否屬實，他也不諱言若干城市的閒散勞力有90%以上是婦女。²⁷由此可見，官方所謂已經解決失業問題指的是城市男性的工作問題，婦女的就業問題並不在官方考慮之內。馬文瑞勸告那些已經接受官方宣傳，認爲不出外工作就是恥辱的婦女，應該耐心等待國家的安排，或從事無償的義務工作或社會勞動。正因爲要解決男性就業問題，馬文瑞向婦女喊話：「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份，搞好了家務，對黨的勤儉持家的號召身體力行，同樣是光榮的。對有子女的人說，家務勞動的責任還是很重大的。使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能安心的工作和學習，也是對革命的貢獻。……一個有覺悟的同志，應當從如何對革命事業有好處來考慮問題，來解決個人與集體的關係。」²⁸簡言之，婦女應以家庭爲第一優先，出外就業是男人

²⁷ 馬文瑞，〈進一步地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年第15期，頁4。據蔣永萍研究，1949-1957年屬於中國城市婦女不完全就業期。蔣永萍，〈50年中國城市女性就業的回顧與反思〉，《半個世紀的婦女發展——中國婦女五十年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152-162。

²⁸ 馬文瑞，〈關於幹部下放進行勞動鍛鍊和參加基層工作的問題〉，《勞動》，1958年第1期，頁8。

的事。馬文瑞這番談話，等於推翻原來官方就業去性別化的立場，回到鼓吹傳統的性別分化：男主外，女主內。可見官方處理就業問題的原則是：先城後鄉，先男後女。因此，凡是具有「政治正確」觀念的城市婦女，都應該欣然接受黨對勞力需要的調控與指揮。

同樣地，官方對待農村婦女勞力的態度，一如城市，需要接受黨的調控。中共主張在勞力缺乏地區，發動和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和其他生產勞動，沒有勞動習慣的也要養成勞動習慣。在勞力過剩的地區，則發展婦女從事林牧漁業和手工業，鼓吹飼養家禽家畜等是最適合婦女的工作；這樣的態度無異又回到傳統的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50年代的陝西爲了增加棉花產量，省委與省婦聯特別強調棉花豐產與棉田管理乃是最適合婦女特質的工作：婦女心細手快，更能符合棉務工作與管理的繁瑣與細緻。這樣的強調所產生的結果是鮮明的性別分工：粗重的種棉與拔棉桿由男性擔任，細密的摘棉與棉田管理完全由婦女擔任。²⁹

再者，由於農村支援婦女出外工作的配套措施嚴重不足，中共必須特別強調不能因爲參加生產而置家務於不顧。「參加生產是光榮的，擔負家務勞動也是很必要的。」在1950年代初期，即便大城市如上海都有托兒設施不足的問題，遑論落後的鄉村。有關當局只好再三呼籲農村婦女不可輕忽家務和養兒育女的責任。官方提出解決家事與農務衝突的辦法是：「農閒與天雨時，準備好全家衣服鞋襪；農忙時，從事農業勞動。」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³⁰官方並沒有建議農閒期間男性也應該分擔家務，也等於是說家務仍是女

²⁹ 高小賢，〈「銀花賽」：50年代農村婦女與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北京），2005年第4期，頁153-171。

³⁰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關於當前農村婦女工作的指示〉，《新中國婦女》，1954年第8號，頁3。

人必須、也應該承擔的「份內職責」。這樣的思維與史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如出一轍。蘇聯實施工業化之後，高層領導感到勞動力的短缺，因而逐漸由理論走上實踐，促使婦女參加勞動生產。不過，即使蘇聯比中國進步，蘇聯政府能夠提供婦女減輕家務負擔的支援依然十分短缺。既然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婦女勞力，因此史大林時期的政策一直強調家庭與工作可以兼顧，而且這個政策是不容挑戰的。³¹

除了中共官方實際上對農村婦女勞動的實踐有性別分工的傾向之外，農村中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也是阻礙婦女出外勞動的原因之一。例如，安徽廬江縣的婦女向來不參加生產。偶而下田，就被譏笑。有一婦女下田幹活，天忽然下雨，有人就說是因為婦女下田的關係。這位婦女被說得滿臉通紅，以後再也不肯下田。也有婦女想參加生產，卻沒人帶小孩，地方幹部也不幫忙解決問題。³²類似之例，不勝枚舉。自然，中國幅員廣大，婦女參與勞動的地域性差別極大。東北土地多，當地婦女參與勞動的比例要比南方婦女多。據官方統計，1949年東北全區參加農業生產的婦女佔女性勞力的60%，1952年達到80-90%。其次，中國農村經過連年戰爭，即使有勞力不足的問題，由於傳統觀念作祟，農村婦女出外從事的工作仍以非技術性、非重體力的工作為主。根據統計，在1952年，隨著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展開，全國約有30-40%的婦女參加了農業互助組的生產。³³中共則期望從1956年開始，在七年之內，要求農村男子全勞動力每年至少做250個工作日。並積極發

31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19.

32 〈讀者來信〉，《人民日報》，1952年10月29日，2版。

33 黃西韻，〈中國當代社會變遷中農村婦女經濟身份的轉換〉，《社會學研究》（北京），1990年第6期，頁62。

動婦女參加農業和副業生產的勞動，在七年之內，要求農村女子全勞動力每年不少於120個工作日。³⁴由此可見在大躍進(1958-1960)之前，農村婦女出外勞動的比例仍低。

大躍進時期，中共號召全民辦工業、興水利，使得全國勞力頓呈明顯短缺。就在勞動部長鼓勵婦女回家以紓解就業市場壓力的四個月之後，《勞動》雜誌又出現鼓勵婦女出外工作的論點。首先，刊登了列寧認為婦女解放需從家務解放開始的文章。列寧相信男女平等，不應該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應該要使婦女獲得經濟和社會上的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該讓婦女成為家事的俘虜。若將婦女只侷限在做飯和照顧小孩上，會使她們變笨與受人鄙視。而國家辦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就是要逐步解放已成為家庭奴隸的婦女。³⁵《勞動》引用列寧的觀點等於是間接駁斥了馬文瑞先前要求婦女以家為重的論點。

接續列寧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婦女若能從家務勞動中得到解放，則可以解決農村在合作化後勞力不足的問題。有些地方或許在一時之間仍然勞力過剩，那是因為還沒有擴大生產規模、沒有進行多種經營、耕作還沒精緻化之故。毛高喊「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³⁶顯而易見地，毛澤東要積極開闢婦女這項人力資源，鼓勵婦女投入生產建設，乃是為時勢所迫、必須解決全國勞力不足問題之故。

34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人民日報》，1956年1月26日，2版。

35

1958年中共對婦女政策的轉折，見金一虹，〈文革時期中國婦女的勞動〉，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113；〈列寧論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年第15期，頁2。

36

〈毛主席論解放婦女勞動力〉，《勞動》，1958年第15期，頁3。

當時由於大批男性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使得無論是城市或農村的婦女均大量外出勞動。城市的大規模招工使農民進城工作者多，農村婦女或出於志願，或迫於現實因素，從事農活者亦眾。據估計，大躍進期間一般婦女參加田間工作的勞力佔總勞力的60%。³⁷也就在這個時期，「鐵姑娘」一詞開始頻繁地出現在《人民日報》。早在1950年代初即可零星看到官方以「鐵姑娘」形容那些進入傳統男性職業場域的婦女先鋒；她們沒有傳統姑娘的柔弱形象，而是擁有鋼鐵意志、勇於打破保守思想的新女性。³⁸當時「鐵姑娘」一詞，強調的是新舊婦女的對照，而且多半是個案。到了大躍進時期，官方宣傳「鐵姑娘」事蹟，除了讚揚婦女勇敢且熱烈地投入生產之外，這個名詞所代表的去性別化意味也漸漸明顯。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鐵姑娘」已不再是零星個案，而是成群結隊、風起雲湧地在各地出現，因而成為文革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這些鐵姑娘隊的出現等於具體實踐了過去中共官方宣傳的男女平等，工作去性別化。特別是當毛澤東登高一呼「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可以撐起半邊天」、「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更將婦女可以擔任男性所做的任何工作的觀點推展到極致。官方強力宣傳「鐵姑娘隊」所想要傳遞的訊息是：生理不是決定一切的條件。人的努力與意志可以克服所有客觀的限制。婦女可以在體力與智力上與男性平等。實際上，這些訊息所反映的卻是女性的價值由男性的標準來衡量。³⁹當時幾乎

37 俞小波，〈婦女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人民日報》，1960年3月8日，7版。

38 常瑞敏，〈「三八」婦女測量隊在成長中〉，《東北婦女》，1953年4月（結束號），頁7-9。（評論：打破婦女不能幹這幹那的保守思想），《勞動》，1959年第1期，頁15。

39 Emily Honig and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所有的鐵姑娘隊成員都年輕未婚。有些隊伍的形成是婦女對官方宣傳的回應，但也有很多不是自發性的組成，而是因為某些工作勞動力不足，只好組織婦女去做。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女的在一線的多，男的反而像蔥花般的點綴。⁴⁰以數量而言，鐵姑娘大隊其實只佔全國婦女的極少數，她們卻是國家宣傳機器的重要樣板。文革時期婦女參與勞動生產的數量究竟是多少，因為十年動盪而資料付諸闕如。

文革時期常見諸報端「鐵姑娘隊」的有女子採油隊、鑽井隊、帶電作業班、架橋班、女子搬運班、雷鋒女子民兵班、拖拉機班、鋸木隊、海洋採殖班等。為了彰顯中國工業發展的進步，與農業相關的拖拉機班雖列名其中，卻不是官方宣傳的焦點。這比起1950年代初轟轟烈烈地宣傳女拖拉機手，1960年代的女拖拉機手班宣傳反而像陪榜，當然這與中國農村機械化發展的遲緩有關。

1955年夏天，毛澤東曾估計全中國要完成基本農業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至五個五年計畫，即二十至二十五年時間。⁴¹換言之，他期望在1980年左右全國能夠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達到「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的境界。事實上，心比天高的毛澤東對中國實行機耕的期望與現實情況有極大的落差。據官方統計，1957年全國機耕面積只有263.6萬公頃，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2.4%。當時人拉犁耕地或開荒的情形仍十分普遍。大躍進時期的農村發展重點之一在於改良傳統農具，可見離農業機械化的理想仍相當遙遠。1962年，全中國才有8.1%的面積機械化，1965年為15%，1980年為41.3%。⁴²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

40 金一虹，〈文革時期中國婦女的勞動〉，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is.asp?id=2113，頁10。

41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卷6，頁438-439。

42 〈中國農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66〉（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頁212。

退次數太多，造成空行時間過大，邊角地也不易耕到。手扶拖拉機雖然輕巧，移動方便，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手扶拖拉機使用也十分費力，而且直到1963年底，手扶拖拉機還在試驗階段。⁴⁴何況即使解決了拖拉機本身的問題，零件、機械製造與燃料供應等也經常發生問題。同時，由於農村一般缺乏運輸工具，政府發給或補助購買的拖拉機，在全國許多地區用於運輸的時間往往超過用於農田耕種的時間（當時卡車價格太高），造成很大的浪費。如上所述的種種，均是阻礙中國機械化的重要因素。

有了拖拉機，還需要人來駕駛。中蘇兩國最初宣傳女拖機手主要是政治上意識形態的考量，數量多寡不是重點。蘇聯即使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農村出現勞力短缺，女拖拉機手人數依然不多。一直到二次大戰爆發，男人都上前線打仗，婦女必須承擔所有農活，女拖拉機手的人數才開始飆升。1935年，蘇聯有女拖拉機手19,000人，到1940年是64,000人。因為戰爭的關係，參加拖拉機手訓練課程的女性由1940年的8.5%驟升到1942年的51%。1943年更升到54-57%，這是最高峰。戰爭結束後，女學員人數就開始急遽下降。到1947年初只有17.4%，1949年僅有5%。從1945年到1949年，拖拉機班學員已經是男性佔絕大多數。蘇聯農業部為挽回女拖拉機手的急劇流失，在1951年甚至頒布特別法令，要求拖拉機站的訓練班至少需有30%成員是女性，但此舉無濟於事。到1954年蘇聯全國只有2.4%的拖拉機手是女性。⁴⁵1959年蘇聯政府廢除拖

1958年4月23日，2版。

44 鄧卓榮、馮唐初，〈我國水田地區拖拉機的探討〉，《人民日報》，1964年11月4日，5版；上海市檔案館藏，A38-2-694，頁44-48。

45 Ю. В. Арутюнян, *Механизаторы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в 1929-57 гг.* (蘇聯農機人員，1929-1957)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0), с. 59-60, 68-69, 115, 301.

目前我們無法得知這些數字如何估算而來，是否準確，不過高估的可能性大於低估。即便沒有高估，中國到了1980年，最多也只有約五分二二的機耕地。換言之，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前，對全國機械化的估算，實有冒進之嫌。

倘若考慮到中國工業基礎比蘇聯還薄弱的情況之下，毛澤東的估計更是離譜。蘇聯在1930年代實行農業集體化，其目的之一就是整合支離破碎的耕地，以利機耕。蘇聯快速工業化的成功，使其在機械製造與燃料取得較容易回饋農業。即便如此，蘇聯也要到1970年代末，亦即建國接近五十年才完成收割、播種全面機械化的目標。更何況蘇聯地勢平坦遼闊，適合大規模機耕。

反觀中國地形則是北部平原廣，南部丘陵多。中國除了北大荒、新疆、內蒙等各地國營農場有大塊耕地之外，其餘農地大多為小塊或丘陵起伏的水田，這些水田種植水稻，只佔全國糧食面積的四分之一左右，產量卻約佔糧食作物總產量的一半，其中90%以上的田地在不適於機耕的南方及長江流域。1950年代初期，中國只有蘇聯製適用於旱地耕作的大型拖拉機。這種拖拉機，無論是履帶式或輪胎式的，到了水田，就深陷泥漿，往往動彈不得，或者壓溝嚴重，造成田面不平。即使還能動彈，行駛時也會泥漿四濺，操作困難。機器若受到泥水侵蝕，又會嚴重磨損，甚至停擺。雖然中國在1950年代後期改良成功，推出適合水田耕種的輪式拖拉機（特別是葉片式驅動鐵輪），⁴³但是這種大型輪式拖拉機碰到小塊耕地，轉彎倒

另一組數據為1957年只有1.64%，1965年有13.5%。見武少文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297、302。兩書都沒有交代這些數據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到了文革後期，中共領導人如聃明中國不可能在「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因此，在1979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宣布停止使用這個口號。

43 李運斌，〈拖拉機實行多種作業——記江西省水田機械化的經過〉，《人民日報》

拉機站，並將設備與人員轉到集體農場時，女拖拉機手和女康拜因（收割機）手只佔全國農機手的 0.7%（17,000 位）。⁴⁶簡言之，二次大戰之後，無論蘇聯政府如何大力宣傳女性要履行他們的愛國義務，並提供比過去優厚的福利措施，都無法吸引婦女踴躍當拖拉機手。到 1978 年全蘇聯的四百萬個農機員中，女性只有 24,000 人。⁴⁷換言之，到了蘇聯農業基本上全面實施機械化之後，女性農機人員只佔全部人數的 0.6%（千分之六）。

反觀中國在 1949 之後，女拖拉機手的數量從來沒像蘇聯那樣曾經達到舉足輕重的地步，而一直是微不足道。中國不像蘇聯那樣曾因戰爭關係，導致農村男性勞力嚴重不足，而需借重女拖拉機手耕種。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地形差異，加上全國農機化程度低，女拖拉機手比例遠遠不及蘇聯。據不完全統計，1957 年全國大中型拖拉機（混合台）約有 14,674 台。⁴⁸目前找不到當時全國拖拉機手總數，只能作大致推算。假設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全數拖拉機都能使用的話，每台拖拉機配置兩名拖拉機手（一般至少兩名，不論性別），那麼最保守的估計，全國約有三萬名左右的拖拉機手。而據婦聯的那統計數字，1957 年全中國的女拖拉機手只有 400 人。⁴⁹女拖拉機手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據梁軍說她男女徒弟的比例是 20:1。估且不論梁軍的記憶是否有誤，可以肯定的是男女比例極為懸殊。大躍

46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ода СССР* (1959 年蘇聯人口普查總結) (сводный том 綜合卷) (Москва: Госстатиздат, 1962), 表 45-46, с. 159-160.

47 “Праздник, рожденный трудом,” (勞力產生的節日) *Журналистка* (農婦), № 5 (1978), с. 6.

48 1962 年有 54,938 台; 1965 年有 72,599 台。《中國農村經濟統計資料, 1949-1966》, 頁 197; 1985 年在國營農場共有 64,183 台, 頁 158。另一數據, 1950 至 1957 年, 共進口拖拉機 16,750 台。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 《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工業》(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頁 21。

49 (人民代表集中批判右派份子), 《人民日報》, 1957 年 6 月 29 日, 1 版。

進之前，婦女出外工作的比例偏低，女拖拉機手人數簡直就像撒蔥花一般地點綴。

1961 年初，陸定一估算中國要根本解決農機化，需要農機駕駛員 184 萬人。⁵⁰但是直到 1965 年底，國營機械站的職工才有 15.6 萬一人，其中有 8.8 萬名拖拉機手。⁵¹而拖拉機手只是農機人員中的一類，即使將機械站所有職工均算是農機人員（其實機械站還有行政人員），全國農機手最多也只有陸定一估算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想見女拖拉機手人數更少。以安徽碭山縣為例，在 1970 年代初，全縣有 2,800 多個鐵姑娘隊，參加婦女達 32,000 多人，其中也只有女拖拉機手 48 人。⁵²因此，我們可以說直到文革結束，女拖拉機手對於中國提高經濟生產的貢獻十分有限，官方宣傳女拖拉機手的目的是主要是政治考量。

三、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與實際生活

研究農村問題最困難的是，很難找到農民自己所寫的文字資料。到底農村婦女如何看待中共宣傳的女拖拉機手，目前資料欠缺，難以得知。倒是在文革初期，中共曾經引發一波瀾壯觀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潮。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眾多女青年亦加入這個人行列。⁵³從許多女知青的回憶錄中可以得知，中共對城市女性的

50 陸定一, 《農業中學創辦二週年》, 《人民日報》, 1960 年 2 月 27 日, 4 版。

51 武少文主編, 《當代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頁 302-303。

52 《把婦女優秀份子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 1973 年 3 月 15 日, 1 版。

53 第一波在 1950 年代中期, 第二波先後有 200 多萬城市青年到國營農場參加開發建設。詳見定直莊, 《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劉小明, 《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此)。這些榮譽與種種可能得到的實質好處，對許多女青年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也是她們紛紛夢想成爲女拖拉機手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希望成爲女拖拉機手的動機五花八門，可以說多種理由並存。有的可能是受到女拖拉機手典型或英雄主義的激勵；也有人可能是因爲官方宣傳中沒有明言的潛在利益所致；有的可能出於私心，只是想出風頭，覺得當女拖拉機手高人一等；有的因爲出身不好，希望能以勞動者的身分，爭取政治認同，以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⁵⁶還有因爲蘇聯電影所引發的浪漫想像——女拖拉機手可以充滿豪情壯志地駕著鐵牛在一望無際的田野奔馳，而且還可以談戀愛。雖然當時中國觀眾並不知道的是，蘇聯電影中所呈現的富裕與快樂的集體農莊生活，在第一個施行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都沒有真正的實現。但是許多人眼見爲憑，信以爲真。即使明白相對落後的中國迎頭趕上不易，也仍然予人無限的想像與希望。宣傳中還會特別強調只要透過不斷地努力，並且聽從黨的領導，那樣的生活美景終將到來。

一位女知青生動地描述她從電影中投射出來的拖拉機手工作情形：「穿上整齊的工作服，把頭髮塞進工作帽裏，坐在我們東方紅拖拉機高高的駕駛座上，手握著方向盤，眼睛注視著前方，在寬敞的大道和廣袤的田野上奔馳。多麼英姿颯爽，多麼威風凜凜，多麼詩情畫意。」等到「美夢成真」的時候，這些瀟灑和浪漫的想像，很快地就被髒、累、險、苦的現實生活所取代。女知青在蘇聯電影中看到的女拖拉機手下班後，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等到她親身體驗之後，方才發現拖拉機手的生活竟是終日與機器爲伍。機器一開，

56 金茂芳原是山東地富子女出身，參軍入新疆當女拖拉機手。張呂、朱秋德編著，〈優秀的女拖拉機手〉，《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頁 91。

宣傳相當成功。許多城市婦女最嚮往的工作之一就是成爲神氣、能幹又浪漫的女拖拉機手。她們自然不能代表所有農村出身的女拖拉機手的聲音，其實女知青自己對農村生活的看法，也都必須存疑、謹慎對待。⁵⁴不過，這些女知青畢竟留下較多文字資料，可以讓人對於女拖拉機手的工作與生活一窺斑豹。至於如何看待農村出身的女拖拉機手的生活、工作等議題，容待日後有機會作口述訪談，再做補充。以下的敘述，主要以女知青的經驗爲主。

在一個講究階級成份、政治背景的社會，要成爲一個拖拉機手需要具備相當條件，不是任何人想當就能當。有關當局選擇拖拉機班學員的主要標準是成份好，最好是貧下中農或工人子弟；而且要「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有一定文化」。不過，即使階級成份不錯，往往也需要群眾推薦，領導考核等等，才能如願。⁵⁵如果階級成份不好，那就更需努力表現，得到黨的認可，才能被錄用。

官方宣傳女拖拉機手典型強調的是婦女解放，勞動偉大，爲黨、爲集體犧牲奉獻，並沒有提及任何物質獎勵。但是中共所標準的典型人物，都有一夕成名的機會；可以從原本籍籍無名的地方小民，一躍而成各大報刊爭相報導的全國性人物。其次，還有可能像梁軍那樣，得到出國訪問、進修或是成爲幹部的好處（即使並非必然如

54 女知青對下鄉插隊生活的回憶和評價與她們返鄉後的社會地位關係密切。詳見 Nora Sausnikat, "Resisting Current Stereotypes: Privat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Former Rusticated Women," in Woei Lien Chong, ed.,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 255-283.

55 除業務課外，還必須上政治課（時事政治，社會發展，共產主義遠景的教育）。楊清海，〈花園農場的初創年月〉，《拓荒者的回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 7；房福田，〈艱苦奮鬥的開荒生活〉，《拓荒者的回憶》，頁 16；上海市檔案館藏，A72-2-533，頁 6；巴瑛，〈那時，我們年輕〉，<http://www.hitelecom.com.cn/html/humy026.htm>。

滿臉蒙黑；還得常常檢修機器，幾乎無時無刻總是一身油黑。⁵⁷此外，坐在拖拉機上也不見得舒服。在炎炎夏季，烈日當空之下，發動機散發的大量熱氣，使得駕駛室像火爐一般；一坐進去往往就是一整天，渾身是汗，衣服乾了又溼，溼了又乾，易長疥瘡。還有飛機的麥芒、泥土，令人全身發癢，極不舒服。若座艙是開放式的，在冬天會凍得要命；若是密閉式的，竟日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也難受。⁵⁸

其次，女拖拉機手最常睡覺的地方不是床上，而是車旁或車裡。農忙耕地，為搶農時，連續出車，數夜不休，幾乎成了農機手的家常便飯。梁軍在還沒收徒弟時，一天兩班，每天至少工作十來個小時。有時候單機黑夜作業；下班不敢回隊，就鑽在麥草堆裡睡覺，到天亮才回隊。⁵⁹再者，農耕之外，又常常得起早摸黑的出車運輸，經歷風吹雨淋日曬，下了日班，又上夜班。拖拉機手往往為了響應國家增產的號召，提出「歇人不歇車」的保證，結果造成機械沒有定期保養或過度使用，加上路況不佳或疲勞開車，車禍頻繁，⁶⁰拖拉機手非死即傷的情況，經常上演。若遇到天冷嚴冬，更是狀況百出。新疆拖拉機手金茂芳曾在攝氏零下45度的氣溫之下工作，機油因為天寒地凍變得太稠，導致拖拉機熄火。她除去手套，用嘴對著管子吸油，結果嘴皮被冰凍的油管黏破了，滿口滿手都是血，她還是繼續吸，直到啟動為止。⁶¹女拖拉機手也有可能茫茫戈壁上，

57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xiilicun.nease.net/Xiilicun/Tractor.html>。

58 〈淮河岸邊的女拖拉機手〉，《人民日報》，1972年3月13日，3版；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人民日報》，1950年1月17日，6版。

59 2004年8月2日，在哈爾濱訪問梁軍；房福田，〈艱苦豪邁的開荒生活〉，《拓荒者的回憶》，頁21。

60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xiilicun.nease.net/Xiilicun/Tractor.html>。

61 天山網訊（記者李秀芬），〈文化成邊：打造屯墾事業的新高地〉，2004年1月6日，<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4/25/200401/06/58692.html>（原載《半月談》，2003年第24期）。

車燈突然壞了，看不見路，卻碰上一群野狼，只好將自己反鎖在駕駛室一整夜，直到天亮，狼群自動散去才解除危險。⁶²或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夜出車運豬，來回幾百里，身無遮擋又沒有大衣保暖，凍得實在撐不住了，就輪流爬到車上的豬堆裏取暖。（豬還不歡迎她們來擠呢！）⁶³

以體力而言，婦女駕駛拖拉機，就像開大卡車，特別是碰上某些機型的拖拉機，需要很大的力氣才能啟動，不一定是每個婦女在體力上能夠勝任。⁶⁴其次，男女生理的其他差異也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困擾。例如，有些男機手很難體諒女拖拉機手在生理期的難處。曾有男拖拉機手因為女助手經期請假，便大發牢騷，甚至也跟著怠工。⁶⁵又如，長時間在戶外工作的女拖拉機手，常常需要憋尿。他們若在生理期過度勞累，或常在天寒地凍的情況下工作，均十分容易留下許多伴隨終生的婦女病或職業病。目前找不到關於中國女拖拉機手患病的有系統資料，不過，蘇聯學者對他們的女拖拉機手研究的結果，可供參考，因為工作性質畢竟相同。據蘇聯學者統計，當過一至三年的女拖拉機手，有三分之一的人生病；當了十年左右的女拖拉機手，有三分之二的人生病；十年以上的，則有三分之二的人生病。⁶⁶雖然中共在大躍進期間再三強調婦女的工作要貫徹「三

62 趙阿華，〈我的父親母親〉，2002年12月19日，

<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12/19/000476240.shtml>。

63 張寧，〈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http://shzq.net/mczl/antifs.html>。

64 金茂芳發動一輛「磨特斯」就需要有12公斤的力量去拉，一些重活、危險的活，硬著頭皮也做。參見張呂、朱秋德編著，〈優秀的女拖拉機手〉，《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生命運故事口述實錄》，頁99。啓動東方紅拖拉機也十分費力，不是一般女子的體力能夠勝任。

65 李德江，〈我當了生產隊長〉，《新中國婦女》，1955年第3號，頁11。

66 Н. Корина, "О тракторе и о себе" (關於拖拉機，關於自己) Крестьянка (農婦)，№ 8 (1987)，с. 18。

調三不調制度」——亦即月經期調乾不調濕、懷孕期調輕不調重、哺乳期間近不調遠，務使婦女在這三期，不下冷水，不作重活，不熬夜。事實上，中共會作這樣的強調，正是凸顯了這種不顧婦女生理期和孕而工作的情形，已經嚴重到不能忽視的地步。⁶⁷

女拖拉機手除了需要克服男女生理差異外，還要面對傳統保守觀念或社會規範對女性擔任拖拉機手的許多挑戰。在中國農村多年來一直還是有「男人不做飯，女人不種地」的觀念。許多男人認為開拖拉機根本「不是女人的工作」；不是因為女性不能勝任，而是因為那是男人才可以做的工作。這樣的心理不但在中國處處可見，甚至到了1980年代的蘇聯也都還非常普遍。蘇聯男拖拉機手常常對女拖拉機手懷有公開的敵意與輕視，有的甚至暗中破壞女拖拉機手的機器。他們也會與農場經理聯手，分派給女拖拉機手最老舊或破爛的機器，以確保他們無法上場工作，讓她們知難而退。⁶⁸此外，傳統的社會規範有時也會造成夜間出車的障礙。女知青在農村有時享有「特殊待遇」，她們若是和男機手在深夜共車工作，比較不會流言滿天飛。但是若換成農村出身的女拖拉機手，則易引起村人的閒言閒語，以致許多男拖拉機手不願和女拖拉機手共車，也有女拖拉機手因為這個緣故而離職。⁶⁹

再者，黨國宣傳機器經常只是口頭上強調男女平等，並沒有真正用心灌輸尊重女性的觀念。事實上，中共的許多宣傳內容也仍然夾雜著缺乏性別意識的論述。譬如女拖拉機手置身在佔絕大多數的男機手中，必須更加努力，才能贏得男機手的「尊重、友善和真心

⁶⁷ 〈人民公社真正好，照顧婦女真週到〉，《勞動》，1959年第1期，頁18。感謝定宜莊教授對此論點的提醒。

⁶⁸ Н. Корина, "Наказаны... рулем," (為方向盤所處罰) *Крестьянка*, № 3 (1987), с. 22.

⁶⁹ 2004年8月2日，在哈爾濱訪問梁軍：紀錄片 *All Under Heaven*, directed by Carma Hinton, 1985。

的認同」。⁷⁰ 正因為如此，許多女拖拉機手為了證明自己不輸於男性，常常志願加班，工作更為賣力，結果使得原來已經很長的工時，變得更長，工作也變得更為繁重。⁷¹ 也因此使得官方宣傳女拖拉機手刻苦耐勞的形象最後成為事實。

女拖拉機手在工作之外，如何對待婚姻、協調家務，更是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絕大多數的女拖拉機手模範都是年輕未婚，如此才能無後顧之憂地全力投注於工作。在蘇聯，男拖拉機手屬於技術工人，收入穩定且高，是農村女性爭相結婚的對象，女拖拉機手在婚姻市場上就沒有男拖拉機手這麼吃香。中國亦是如此。據梁軍說，扯後腿、反對女性當拖拉機手的都是男人，最主要的是現實考量，因為女拖拉機手很難兼顧工作與家庭。女拖拉機手成婚之後，其家人一般多會阻撓或反對她們繼續擔任這個工作；也有結婚之後自己就不願再做了；也有婚後退居二線，當機車修理工。成婚之後還繼續開拖拉機的婦女，多半是嫁給同行的農機手，畢竟同行的丈夫較能理解拖拉機手工作的辛勞。

女拖拉機手的家務，特別是照顧小孩，主要還是靠上一輩或請保姆幫忙。梁軍回憶說，有一次她抽空回家探望出疹的兒子，三歲的幼兒看到久久未見面的母親，開口叫她阿姨。⁷² 倘若沒有後援的女拖拉機手，那就得各顯神通。最慘的情況則是由於工作忙碌，不得不將小孩送給別人。1950年代初期，湖南一位女兵響應黨的號召，到新疆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夫妻同是農機手，但因為工作忙碌，無暇照顧嬰兒，只好將兩個月大的女兒，送給了別人。⁷³ 這對中共

⁷⁰ 張寧（上海知青），〈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http://shzq.net/mczl/ndis.html>。

⁷¹ 朝紅陽，〈我是公社的拖拉機手〉，<http://xiliicun.nease.net/Xiliicun/Tractor.html>。

⁷² 2004年8月2日，在哈爾濱訪問梁軍。

⁷³ 趙阿華，〈我的父親母親〉，2002.12.19，<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2/>

政權及其所標榜的婦女解放理想真是莫大諷刺。過去中共總是宣傳只有在苦惡封建的舊社會，婦女受到剝削，或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只好忍痛將小孩送人撫養。孰料到了「新社會」，黨鼓勵婦女積極參與勞動，卻無法提供足夠的照顧幼兒機制，結果依然上演父母與親生骨肉被迫分離的悲劇。

同時，黨與社會對男女拖拉機手也有不同的期望。即使女拖拉機手能在技術與體力上勝任這個工作，她還是會被期望扮演其他傳統女性的角色。例如，官方宣傳除了強調梁軍「不僅是勞動婦女學習技術、文化與愛護機器的好榜樣」，而且稱讚她還能在閒暇時間「幫助同志縫補衣服」。⁷⁴相比之下，官方媒體只會報導男拖拉機手閒暇之餘鑽研技術，從來沒看到官方表揚男拖拉機手為人縫補衣服！再者，到了農閒時期，男的可以抽煙聊天，女的仍須繼續操勞家務，完全不得休息。家務似乎成了女性的「天職」。類似情形也發生在蘇聯。例如，在沙拉托夫(Саратов)地區，官方宣布的是男女拖拉機手工作時間都是夏季十小時，冬季七小時。結果所謂「七小時」事實上變成從早上七點工作到晚上七點，夏天的工作時間更長。在夏天，男女一樣忙，大家沒話說；到了冬天男拖拉機手休閒時間較多，而女拖拉機手仍得照顧家庭與小孩。⁷⁵諷刺的是，當中國女勞模參觀蘇聯時，曾經羨慕蘇聯婦女可以在商店裡買到麵包，減少她們作家事的時間。她們不知道的是，這些女拖拉機手卻經常忙得連進麵包店的時間都沒有！也有蘇聯女拖拉機手抱怨她們夏天工作時間那麼長，工作十五年多，從沒有休假期，或與子女共渡暑假；

12/19/000476240.shtml。

⁷⁴ 高盧，〈女拖拉機手梁軍〉（漫畫十幅），《新中國婦女》，1950 第 6 期，頁 2-3。宋美妮，〈托起巾幗的是黨〉，www.china-woman.com/gb/zhuanti/jiandang/zgnx-4.htm。

⁷⁵ Н. Корина, "Наказы ... рулем," *Крестьянка*, № 3 (1987), с. 23.

或在九月開學日，快樂地陪伴剛進小學的子女到學校。⁷⁶這樣的抱怨也反映出中蘇生活水準的落差。蘇聯工人每年均有固定的休假，中國則到文革結束前，休假制仍是聞所未聞。不過，由目前所見資料，儘管中蘇婦女都覺得家事育兒的負擔重，卻未見她們抱怨男人也應該分擔家務。這是否暗示她們認為分擔家務與否，和男女平等的議題無關？

由於資料的不足，本文無法從各個方面來檢驗婦女成為拖拉機手之後，是否感到男女平等？她們所瞭解的男女平等意涵又是什麼？前面提到女拖拉機手的艱辛之一，是要爭取男機手的認同。這種隱含的不平等，目前所見資料並未有更多的著墨。不過，有一項比較具體的指標，可以檢驗男女平等的一個面向，而且這個問題幾乎是每位勞動婦女都會遭遇到的，那就是男女是否同工同酬。

早在 1952 年，山西平順縣西溝村的申紀蘭因為在村裡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當時被譽為「創舉」，還因此被選為全國勞模。⁷⁷在國營農場的女拖拉機手屬於農業工人，他們與城市工人一樣是領薪資的（若是生產隊的農機手則領工分）。但是城市女工都不一定與男同工同酬，遑論農村。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直到 1970 年代初期，男女同工同酬的理想在農村依然遙不可及。我們可以從《人民日報》在 1972-1974 年突然大量報導與強調落實同工同酬的政策，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中共之所以突然在 1970 年代初期特別重視要落實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主要是因為從 1971 年開始，正好是中國進行規模最大的農田水利建設的時候，絕大多數男勞力均出外參

⁷⁶ Н. Корина, "О тракторе и о себе," *Крестьянка*, № 8 (1987), с. 17.

⁷⁷ 申紀蘭雖然爭取到同工同酬，但他在許多方面也是默認男尊女卑。藍村，〈「勞動就是解放，鬥爭才有地位」〉，《人民日報》，1953 年 1 月 25 日，2 版；天和，〈紅色人生：勞模申紀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89-118。

平心而論，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村的勞動都很辛苦，拖拉機手的工作也不例外。工時長又密集，工作重又累人。連農家出身的梁軍也不諱言，拖拉機手的生活確實辛苦，所以她的收徒弟標準是「身體好，能吃苦，熱愛專業」。⁸³問題是又有多少女拖拉機手能夠僅僅憑著能吃苦、熱愛專業，日復一日地度過他們艱辛勞累的歲月？全國婦聯副主席劉清揚曾批評河北有些農業社設法培養了一批女拖拉機手，但他們同當地駐軍軍官結婚後，就不當了，脫離生產，住到部隊，穿上皮鞋和絲綢衣服，坐汽車回家。這不僅是婦女解放道路上的思想倒退，也對農村幹部和農民有嚴重的不良影響。⁸⁴從中共宣傳社會主義新婦女的角度來看，劉清揚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卻是何不食肉糜之言。因為劉清揚這位養尊處優的副主席，竟日坐在辦公室，從來沒有實際體驗過拖拉機手的工與生活，更不知其中的辛苦。

中共給予女拖拉機手的稱譽，含有光榮、亮麗、燦爛之意。官方宣傳報導中也會提及女拖拉機手生活的艱苦和遭遇到的困難。不過，這些困苦都意味著一種必要的歷練，是成就社會主義新人不可或缺或經驗。所以，即使女拖拉機手有一時的頓挫或消極的思想，最後總會因為毛主席偉大思想的鼓舞與黨的領導，而堅持到底，克服困難，完成任務。這種用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為精神支柱，咬牙撐過簡陋生活和艱困工作的例子當然很多。⁸⁵但是我們也可以想像他們是因為形勢所迫，不得不爾；或理想和現實的考慮兼而有之。只是目前缺乏相關資料，尙無法釐清箇中詳情而已。

83

2004年8月2日，在哈爾濱訪問梁軍。

84

劉清揚也是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河北省人民代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統戰部繼續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出尖銳批評和改進工作的積極建議），《人民日報》，1957年5月16日，4版。

85

張寧，〈我當淮北平原上第一個女拖拉機手〉，<http://shizq.net/mcz/ntjfs.html>。

加基本建設，出現農活勞力嚴重不足的現象，要調動婦女的積極性，吸引婦女參與農事，執行同工同酬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⁷⁸也只有同工同酬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經濟問題，而「首先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路線問題」之後，⁷⁹中共地方幹部才會重視，而且大張旗鼓的宣揚。同工同酬實行之後，婦女出勤率果然大大提高。例如，湖南汨羅公社認真執行同工同酬之後，大隊婦女的出勤率由40%竄升到90%以上。⁸⁰目前找不到直接來自女拖拉機手對於同工不同酬的看法。不過，女拖拉機手也是鐵姑娘隊的一種。其他鐵姑娘隊的觀點多少反映出一些看法。似乎有這樣的傾向，女知青組成的鐵姑娘隊較多會認為男女同工同酬是理所當然，⁸¹但也不是所有鐵姑娘都會意識到同工不同酬是個問題。有人覺得工分拿得比男的少，是種「無私奉獻的精神」。也有鐵姑娘認為幹得多，拿得少，才能讓群眾信服。還有人仍認為女人就像窗戶，再大也大不過門；女人再能，也能不過男人。她們進而認為同樣工作，男性比女性領得更高的工資是應該的。⁸²這些鐵姑娘們對同工是否應該同酬有不同的認知，亦反映出對男女平等的解釋，因人而異。其差異性之大，甚至有如光譜的兩極。

78

金一虹，〈文革時期中國婦女的勞動〉，頁9；〈老隊長的方案〉，《人民日報》，1971年11月29日，3版；《人民日報》在1972年有38篇文章提到男女同工同酬，1973年有44篇，1974年有25篇。由於1973年展開批林批孔運動，此後各地均將未落實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全歸咎於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

79

金繼祖、洪松，〈男女同工要同酬——評農村分配問題上的一種錯誤傾向〉《紅旗》，1972年第2期，頁61。

80

〈汨羅公社黨委成員聯繫執行政策中的問題〉，《人民日報》，1972年8月15日，2版。

81

Zhai Zhenghua (翟振華), *Red Flower of China: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oho Press, 1992), pp. 170-171.

82

金一虹，〈文革時期中國婦女的勞動〉，頁15。

1990年1月，中共頒令禁止婦女從事重體力、井下、野外作業，拖拉機手的工作亦在被禁之列；俄國在1992年1月禁止。中俄兩國立法禁止婦女從事重體力工作，或許意在保護婦女。但由法律來否定婦女自行選擇職業的權利，是否又落入同一窠臼——婦女就業選擇仍由國家代為決定？婦女的自主權又在哪裡？共產黨高唱在革命成功之後，婦女就能當家作主，實際上卻一直是黨國在為婦女當家作主。男女平等的意義之一應是男女對工作都有同樣的選擇權。若要婦女從事傳統男性或重勞力的工作，應該先問婦女願不願做，由她們自己選擇決定要或不要。

蘇聯與中共在建國之後，宣傳婦女加入勞動生產，最初是基於政治上意識形態的需要，⁸⁷而不是實際情況的考量。蘇聯一直要到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由於農村勞力匱乏，方才開始積極地宣傳與鼓勵婦女成為拖拉機手。到了二次大戰爆發，農村生產更須依賴婦女，女拖拉機手的人數急劇竄升；戰後政府雖然對女拖拉機手提供各種優惠措施，人數仍一路下滑。從政府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蘇聯的推廣女拖拉機手基本上算是成功的，他們在國家農業最需要人力的時刻投入生產，貢獻不可抹滅。反觀中國自始至終，女拖拉機手人數極少，而且絕大多數集中在全國有限的國營農場，人數總像灑蔥花一般地點綴在眾多男拖拉機手之中，政治宣傳意義遠遠高於實質經濟效益。這固然因為中共建國後，沒有發生遍及全國的戰爭（韓戰戰場不在中國境內），沒有像蘇聯那樣有勞力嚴重不足的現象（許多地區反而有勞力過剩的問題），而且機械化的條件遠遜於蘇聯。不過，女拖拉機手與中國農村勞力多寡的關係，仍有待更進一步細緻化與區域性的研究。

87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97-98.

四、結 論

中共建國初期，在全面學習蘇聯的政策之下，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新婦女的典範，使得各種從事傳統由男性擔綱工作的婦女，均成為官方宣傳的焦點人物。其中的女拖拉機手乃是代表農村婦女解放與農村現代化的最重要典型之一。中共的宣傳女人能夠扶洋犁，不但意含男女平等，同時也象徵中國已經逐漸邁入機械的現代國家之列。不過，欲成為社會主義新婦女有一最關鍵的前提：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當黨的意志實際上是男性價值的體現時，男女平等的概念往往淪為共產黨操弄婦女，使其符合黨國利益的工具而已。

中共藉著宣傳女拖拉機手，相當成功地塑造出一個農業機械化與婦女解放的新中國形象。許多城市婦女嚮往成為女拖拉機手，即為明證。不過，當她們「美夢成真」之後，方知實際生活與官方宣傳有很大的落差。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女拖拉機手與其他鐵姑娘隊典型，卻備受批評。許多人認為那是過去極左政策下的產物，連當過鐵姑娘隊的成員也認為這些重體力或危險的工作對婦女健康的傷害太大，而反對婦女再從事類似工作。⁸⁶19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出現「婦女樂於回家」的論調。這個論點緣起於天津郊縣大邱莊的婦女，由於家庭經濟不虞匱乏，紛紛辭工回家，樂於當家庭主婦。1988年，《中國婦女》雜誌即以此為主題，廣邀讀者，展開關於「女人的出路」的辯論。大家討論改革之前的婦女解放是否是真正的解放？婦女是經濟改革下的犧牲品，還是獲益者？女人的最佳出路是回家，還是就業？綜合讀者所表示的意見，歸根究底的問題是：什麼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

⁸⁶ 金一虹，〈文革時期中國婦女的勞動〉。

若是從男女平等的角度來看，中蘇兩國推廣女拖拉機手的經驗，均以失敗告終。一則因為拖拉機手的工作辛苦，連蘇聯男拖拉機手，仗恃技術在身，都是一有機會就到城市另謀高就，從事薪水更高、工時固定的工作；遑論需要克服生理問題，又需照料家務的女拖拉機手。他們在經濟允許，又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往往寧願留在家中或從事其他職業，而不願擔任這種勞苦、易受男機手排擠又難以兼顧家庭的工作。⁸⁸中國的女拖拉機手未嘗不是如此。其次，中蘇兩國主政者最終以男性思維主導的國家權力禁令婦女擔任拖拉機手，乃是對婦女自由選擇職業權利的侵犯，也是一種男女不平等的表現。

對女拖拉機手而言，除了工作與傳統觀念的挑戰之外，她們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家務與工作的協調。這一點中蘇皆然。同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如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之類，官方宣傳焦點是要效法他為革命獻身的精神，卻從來沒要求保爾等男性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同時還需要照料家務與家人，或者頌揚他在餘暇還會為人補衣等「婦女的」美德。事實上，如何協調家務與工作的衝突，是全世界婦女經常面臨的問題。只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由於黨的強勢操作，婦女付出的代價更大。

88 Н. Корина, "О тракторе и о себе," *Крестьянка*, № 8 (1987), с.17-18.